

# 評介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 時期的中國政治》

陳國聖\*

書名：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

作者：聞黎明

出版者：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4年10月

總頁數：375頁

## 一、前言

抗戰期間中國政治的發展以國共兩黨各自的政治演變過程、彼此間的合作與對抗為主軸，而介於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種力量」，亦即史學界較常稱呼之「中間勢力」或「中間力量」黨派，<sup>1</sup>也在當時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發揮了他們的作用與貢獻，儘管中間黨派彼此之間也存在政治立場與政治主張的歧異，但在發展民主政治、實施憲政、團結抗戰力量抵禦外侮等目標上則具有一致性，且對於國共之間的對立與衝突也扮演著居間協調的角色，因此國共兩黨在抗戰期間皆致力於接觸與拉攏中間勢力黨派以利於其自身之發展，而這也構成抗戰期間之中國政治發展的另一種面向。

---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sup>1</sup> 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2。

本書作者聞黎明為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之長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政治史與思想史的研究，而本書即為其近年來最新完成之學術著作。

## 二、內容介紹

本書除了緒論與結語以外，共分為九章。「緒論」部分敘述第三種力量在 20 世紀 30 年代初抗戰爆發前的產生與其在抗戰期間發揮影響力，並將其分為抗日的群眾性團體和組織、國民黨左派、主張改良手段的團體與個人、反共反專制的資產階級政黨四種類型。第一章「問政之初：發端國防參議會」敘述國民政府在抗戰爆發後不久設立國防參議會，邀請國民黨及部分在野黨派加入，沈鈞儒、張君勱、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等中間黨派人士也加入國防參議會，形成了朝野之最初合作的局面，並增進第三種力量各黨派之間的溝通與合作。第二章「論政舞台：國民參政會」敘述第三種力量人士提出成立戰時民意機關的建議，而國民黨也作出成立國民參政會的決定，在野勢力因此獲得登上政治舞台的機會與權利。國民參政會的第三種力量以中國青年黨、中國國家社會黨、第三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救國會、教授派為代表。在野勢力對國民參政會有所認同與批評，而《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的制定，也造成了國民參政會性質問題的分歧性。

第三章「早產的革命：第一次憲政運動」敘述中間黨派與中共在 1939 年秋季於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上發動第一次憲政運動，其在會中提出實行憲政之提案，並引起國民黨與在野黨派的激辯而成立憲政期成會及開展憲政運動；《期成憲草》於 1940 年 3 月底通過，但在 4 月初即遭到國民黨壓制，而第一次憲政運動也於 1941 年底結束。第一次憲政運動前後也產生贊成或反對於戰時實行憲政的論爭。第四章「力求發展：中間黨派的聯合」敘述國共兩黨所產生的摩擦使中間黨派感到擔憂並起而提出解決方案，且於 1939 年 11 月 23 日由主要之在野黨、個別的無黨派參政員組成統一建國同志會，隨之於 1940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改名為「中國民主

政團同盟」，並於 1941 年 3 月改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原有十二條政綱，後來改為十條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的主張綱領〉，強調「第三條路線」與主張「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二屆二次國民參政會通過〈促進民智與加強抗戰力量案〉，民主政團同盟與國民黨的政治交換有成就亦有挫折。第五章「居中斡旋：調解國共矛盾」敘述統一建國同志會於 1940 年 4 月的一屆五次國民參政會作出調解國共關係的首次努力，而 1941 年皖南事變（新四軍事件）的爆發，更使中間黨派致力於協調的工作：提出善後意見、奔走國共之間，及力勸中共讓步，並且寄望於組織各黨派委員會以進行處理，最後結果雖未成功，但對中間黨派之地位與影響的提升仍有幫助。

第六章「溫和改良：第二次憲政運動」敘述抗戰期間的第二次憲政運動始於 1943 年年底，而是年 11 月 12 日憲政實施協進會的成立則為第二次憲政運動的開端。憲政運動於 1944 年初進入重要階段，而民主憲政運動的觀念也於是大為普及。第二次憲政運動在爭取言論自由、爭取身體自由權利、爭取參政會預算權三方面也取得一定之成就，儘管其離真正之民主政治尚有差距。第三種力量在要求實施〈訓政時期約法〉上也作了努力，並獲得社會各界的肯定。第七章「第三種力量的形成：社會力量大整合」敘述 1944 年豫湘桂戰役的失敗造成社會的巨大動盪，而是年 9 月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的召開則揭露不少弊案。教授們有其對學術自由的堅持，而其在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壓力與思想上的受到壓制，使其逐漸轉向批評國民黨。民族工商業者在戰爭中所受到的損失與官僚資本壟斷對其所造成的壓迫，使民族工商業者起而問政。這些因素也促成第三種力量的組成。第八章「建國模式：政權結構的選擇」敘述中共於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提出成立聯合政府的建議，隨後並提出方法，引起包括中間黨派在內之社會各界的關注、討論，形成「聯合政府運動」。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於 1944 年 9 月 19 日開會實行改組並改名中國民主同盟，其目標為將爭取實現聯合政府作為政治民主化的方向。

第九章「嚴峻的考驗：堅持聯合政府路線」敘述國民黨意圖以「還政於民」拒絕在野黨派實施聯合政府等要求，中國民主同盟對此加以抵制，蔣介石則進一步公開拒絕成立聯合政府，但是以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為中心的民主運動則更加興盛，並產生取消國民參政會的意見。六參政員於 1945 年 7 月初訪問延安以調解國共對立，<sup>2</sup>而中間黨派在四屆一次參政會中反對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國民黨的專斷。「結語」部分，聞黎明將本書內容以簡潔的文字加以總結，並指出對第三種力量之研究的重要性。

### 三、對本書之評論

本書內容呈現在章節安排上為以分為不同專題分章進行敘述，大體上為依照時間順序的先後加以排列，使讀者在對於本書的時間意識方面可產生連貫而順暢的感受，也有助於讀者了解本書之內容，並使讀者避免因時間順序倒置而產生認知錯亂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本書能直接在章節上標明時間界限而不是在內容上才敘述某一時間點的話，則章節之安排可望更臻完善而有條理。在內容上，本書有其優點，也有其可斟酌之處，在優點方面：

#### (一) 立場平實客觀、未帶個人成見

如前所述，作者為聞一多之長孫；而人所週知的是，聞一多在 1946 年 7 月 15 日遭到特務殺害，<sup>3</sup>使得聞黎明對於國民黨或多或少懷有痛恨之意，不過聞黎明並未將其個人之主觀意志表現在本書的內容敘述與評價上，亦即本書並未如過去大陸之學術著作那樣對抗戰時期的國民黨極盡貶低、醜化為實行「反動」政策、「法西斯統治」，<sup>4</sup>而是以

<sup>2</sup> 六參政員為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冷通、章伯鈞、傅斯年六人。

<sup>3</sup> 李公樸與聞一多分別於 1946 年 7 月 11 日、15 日遭到國民黨特務殺害，史稱「李聞血案」。

<sup>4</sup> 如姜平在《中國民主黨派史》中即將國民黨於 1939 年 1 月召開之五屆五中全會所制定的「防共、限共、溶共」等政策稱之為「反動」政策，及指出國民黨於 1940 年先後發動「兩次反共高潮」，全面加強「法西斯統治」。見姜平，《中國民主黨派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頁 139、179。

史實為主、史料為輔的方法來對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與國民黨加以研析，並作出較為平實、客觀的肯定與批評；另一方面，聞黎明身為大陸學者，其在本書有關中共的內容之敘述與評價上也並未對中共刻意地溢美、誇耀而將歷史如實地呈現出來，當然亦無政治宣傳的意涵在內。如本書第 327 頁與第 80 頁即指出，聯合政府或國民大會為國家政治制度上之真假民主的分別；國民黨於 1945 年 5 月 14 日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關於國民大會召集日期案》，指出國民大會一定要開，但其職權仍待決定，顯示國民黨以此對付中共與中間黨派，國民大會也不可能無法獲得實權。<sup>5</sup>中共在抗戰期間則一直將國民黨的抗日態度與其對日妥協與否相聯繫，認為國民黨抗日堅決程度的強弱會影響國共關係，因而中共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結束後所採取的第一個反應為警惕國民黨對日妥協的可能，並要「積極幫助蔣與督導蔣向好的一邊走」，以阻止蔣介石向日本妥協。<sup>6</sup>

由上列敘述亦可知，國民黨在抗戰期間不斷以各種方法集中與擴大政治權力，使得憲政運動一直未獲得具體成果，其對中共與中間黨派在實施民主憲政上所作的表態，基本上也具有相當程度之應付的性質；而中共在抗戰期間則一直注意國民黨的抗日決心與態度，顯示其對國民黨的戒心與提防，且對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可能破裂也有所心理準備，<sup>7</sup>當然中共也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局面下不斷擴張勢力。而所謂「見微知著」，由上列敘述可以看出，就本書之整體內容來看，其立場的公正與超然實值得肯定。

## （二）對第三種力量的左右兩派之論述的公允、真實

作者在本書的編寫對於中間黨派之左派政黨與右派政黨的敘述也並未帶有主觀色彩，如其在對青年黨、國社黨等右傾政黨的論述即並沒有從傳統中共史學的觀點來加以貶損，如本書第 28 至 30

<sup>5</sup> 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頁 327。

<sup>6</sup> 同上註，頁 80。

<sup>7</sup> 第一次國共合作則為 1924 年孫中山主導之國民黨「容共聯俄」政策，至 1927 年 4 月 12 日因蔣介石在上海實行「清黨」與其後汪精衛於 1927 年 7 月實行之「武漢分共」而宣告失敗。

頁與第 35 頁即指出，曾琦、李璜等人於 1923 年 12 月 2 日召開中國青年黨成立會議，正式建立中國青年黨；反共為青年黨的目標，其成立宗旨上之「國賊」即「以共產黨為主體」；且青年黨也反對國民黨的「容共聯俄」政策，使其對國民黨左派亦加以排斥、打擊。<sup>8</sup>國家主義是張君勱所抱持的政治意識形態，其與青年黨一樣反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並曾與青年黨主張聯合反蘇反共、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sup>9</sup>由上可知，聞黎明可謂就事論事地敘述了青年黨與國社黨之反共、反對國民黨左派的情形。

同樣地，本書對於第三黨、救國會等左傾政黨的論述亦如實地呈現其政治觀點與立場。基本上，第三黨、救國會的民族意識皆相當強烈，其集中一切抗日愛國的力量共禦外侮的主張亦與青年黨、國社黨等其他中間黨派無異，而其在政治意識形態方面則主張實行社會主義，和青年黨、國社黨等右傾政黨相反，如本書第 40、43、44 頁與第 53、54 頁所指出，第三黨在面對日本侵略的問題上採取「發動民族革命的戰爭」和「與世界上的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民眾，結成聯合戰線」，實現政治策略與行動方針的調整、轉折。<sup>10</sup>救國會的政治態度則為全國各黨派團結共同抗日，「為抗敵而統一，以抗敵求統一」。<sup>11</sup>聞黎明在論述上並沒有主觀論斷，而是以有力的史實與史料來加以論述，使其生動而真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也使人們能較為具體、深刻地了解第三黨與救國會的政治觀點與立場。

### （三）參考文獻的深廣度兼具

本書所參考的文獻資料方面共分為檔案、訪問記錄、資料集；文集、日記；學術論著；外國譯著；傳記、年譜、回憶錄；當時雜誌；當時報紙七大類，其中屬於第一手史料的檔案、訪問記錄、資料集共有 45 種，文集、日記有 35 種，當時雜誌有 32 種，當時報紙有 21 種；而屬於第二手史料的學術論著有 18 種，外國譯著則有

<sup>8</sup> 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頁 28、29。

<sup>9</sup> 同上註，頁 35。

<sup>10</sup> 同上註，頁 43、44。

<sup>11</sup> 同上註，頁 54。

9種；而兼容第一手史料與第二手史料之性質的傳記、年譜、回憶錄則有29種，在種類與數量上可謂相當廣泛，且第一手史料的運用遠較第二手史料為多，這就使得本書的內容與觀點具有相當程度的原創性，且避免了為他人所影響而喪失自主性的情形。

另一方面，本書所參考的文獻資料大體上皆出於海峽兩岸，同時在國民黨、共產黨與中間黨派三個部分的文獻資料上皆有所取用，也使得本書參考文獻的深度有所提升；而與台灣的文獻資料相比，作者在本書所引用之大陸的文獻資料可謂相當充分，同時因為許多文獻資料屬於當時之會議紀錄、期刊雜誌與報紙、當時人之見聞，因而其記載與評論亦具有其時代意義，其分析之精準也值得肯定。當然，如果本書能夠多參考台灣學術機構所藏之蔣介石的相關檔案，及台灣學者陳正茂所編輯之青年黨出版的政論性刊物、青年黨領導人如曾琦、左舜生等人的回憶錄等台灣文獻資料，相信將能使本書之內容更加豐富與充實。

對本書之值得商榷之處的討論：

### （一）部分章節之名稱的不甚妥當

本書在各章名稱的撰寫上可謂使其既具有學術性，又具有文藝性，而有吸引讀者閱讀的功效，不過其在字詞的運用上也有需要另加斟酌之處，如本書第三章的章名為「早產的革命：第一次憲政運動」，按憲政運動的性質來看，其屬於抗戰期間之政治改革的範疇，因而以「革命」一詞來形容第一次憲政運動，從嚴格意義上講並不是十分適切的作法，依筆者的意見來看，將「革命」一詞改為「改革」或「變革」應該更為恰當。又如本書第七章的章名為「第三種力量的形成：社會力量大整合」，按照本書的敘述，「第三種力量作為一種社會勢力，出現於30年代初期。」<sup>12</sup>且第三種力量「廣義上講，凡是處於國民黨、共產黨之外的一切有形的無形的社會力量，都應包含其中。」<sup>13</sup>因而以「第三種力量的形成」一詞來形容教授、民族工商業者等社

<sup>12</sup> 同上註，頁2。

<sup>13</sup> 同上註，頁3。

會力量的凝聚與集結亦非相當合宜的作法，如果能夠以「第三種力量的『壯大』」來取代「第三種力量的『形成』」，將會使章名之意義更為通順、適當。

## (二) 對其他中間黨派的略而不提

由於國民參政會為中間黨派在抗戰期間之主要活動舞台，而抗戰期間中間黨派能有所表現，主要亦由於國民參政會的存在與運作，使得本書對中間黨派的論述主要集中在青年黨、國社黨、第三黨、職教社、鄉建派、救國會、教授派、統一建國同志會、由三黨三派（青年黨、國社黨、第三黨、救國會、職教社、鄉建派）組成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及其改組後之「中國民主同盟」的運作與發展的過程；但另一方面，本書對於抗戰期間的其他中間黨派，如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sup>14</sup>自然科學座談會，<sup>15</sup>以及抗戰期間即進行政黨籌備工作，至抗戰勝利後正式成立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sup>16</sup>九三學社、<sup>17</sup>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sup>18</sup>中國民主建國會、<sup>19</sup>中國民主促進會等則並未提及，<sup>20</sup>儘管中間黨派中之主要政黨在第三種力量中有其重要性與主導性，但其他黨派的存在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從第三種力

<sup>14</sup> 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為中共的周邊組織，於 1941 年夏季在重慶成立，至 1949 年 9 月 17 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宣告解散。

<sup>15</sup> 自然科學座談會為周恩來與新華日報社社長潘梓年領導下，於 1939 年春季在重慶組織成立，其後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籌備會於 1944 年年底成立，至 1945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自然科學座談會的部分成員並於 1944 年冬季與許德珩、稅西恆等共同發起組織民主科學社。

<sup>16</sup>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前身為民主同志座談會，由譚平山等人發起組建，其為國民黨內之組織，至 1944 年確定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為組織名稱，於 1945 年 10 月 28 日在重慶正式成立。

<sup>17</sup> 九三學社為民主科學社於 1945 年 9 月 3 日為慶祝與紀念抗戰勝利而改名並成立九三學社籌備會，1946 年 5 月 4 日，九三學社在重慶正式成立。

<sup>18</sup> 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為繼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之後在國民黨內建立之另一組織，由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人發起組建，其於 1944 年即展開政黨籌建的工作，至 1946 年 4 月在廣州正式成立。

<sup>19</sup> 中國民主建國會為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人發起組建，其為代表民族工商業及其知識份子的黨派。黃炎培等人在抗戰勝利前夕即展開建立民主建國會的工作，於 1945 年 11 月 28 日在重慶成立籌備會，至 1945 年 12 月 16 日正式成立。

<sup>20</sup> 中國民主促進會為馬敘倫等人發起組建，其籌備工作於抗戰期間即已展開，至 1945 年 12 月 30 日在上海正式成立。

量的整體面貌來看，這也算是本書內容的美中不足之處。為何本書對這些中間黨派略而不提，亦為本書所留下的問號而值得改進。

### （三）對 1942 年之歷史發展的缺漏

本書內容的時間分期大體上為從 1937 年 7 月 7 日全面抗戰爆發至 1945 年 7 月四屆一次國民參政會通過有關國民大會的決議，與本書的書名可謂名實相符；但另一方面，若對本書內容之各個時間點加以分析、觀察，則不難發現到，本書從第一章「問政之初：發端國防參議會」到第五章「居中斡旋：調解國共矛盾」之內容的時間分期基本上是從 1937 年 7 月 7 日全面抗戰爆發，到 1941 年 3 月中間黨派調解國共矛盾的失敗；而第六章「溫和改良：第二次憲政運動」到第九章「嚴峻的考驗：堅持聯合政府路線」之內容的時間分期則基本上是從 1943 年 9 月中間黨派對憲政運動的實行表示態度，到 1945 年 7 月四屆一次國民參政會通過有關國民大會的決議。在這一方面，本書顯然對 1942 年期間第三種力量與中國政治發展的過程有所遺漏，儘管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於 1942 年春季接納沈鈞儒及其領導的救國會加入，但本書也並未說明沈鈞儒及救國會加入的確切時間，而是將其列入第四章「力求發展：中間黨派的聯合」予以平鋪直敘。<sup>21</sup>究其實際，本書之所以對 1942 年的史事有所缺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對本書所留下的遺憾，而這些情形之所以出現於本書，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本書分為不同的專題來分章敘述有關。

此外，作者在本書出版之前曾就書中相關內容以論文的形式發表於學術刊物上，<sup>22</sup>而本書內容在某種程度上亦為其先前發表之學術論

<sup>21</sup> 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頁 144。

<sup>22</sup> 如聞黎明，〈國防參議會簡論〉，《抗日戰爭研究》，1 期（1995），頁 86-99；聞黎明，〈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第三種力量〉，《抗日戰爭研究》，2 期（1998），頁 1-12；聞黎明，〈“國民大會議政會” 芻議—抗戰時期改革中央政治體制的重大設計〉，《抗日戰爭研究》，3 期（1996），頁 69-88；聞黎明，〈皖南事變時期的中間黨派—關於中間勢力的研究〉，《抗日戰爭研究》，4 期（2002），頁 40-80；聞黎明，〈黃炎培與抗日戰爭時期的第二次憲政運動〉，《近代史研究》，5 期（1997），頁 147-165；聞黎明，〈1944 年：中國社會的歷史性轉捩—兼論民族工商業者“問政”的原因〉，《近代史研究》，4 期（1995），頁 25-47；聞黎明，〈論抗日戰爭時期教授群體轉變的幾個因素—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為例的個案研究〉，《近代史研究》，

文的改寫與增刪，這也形成本書遺漏 1942 年間第三種力量與中國政治發展之過程的原因。

#### 四、本書與其他同類型之著作的比較

##### (一) 本書所具之貢獻

中間黨派彼此的政治主張有其相同面，也有其不同之處。大體上，中間黨派積極倡導民主憲政，並因此而先後促成兩次憲政運動的發展與中國民主同盟的組成，「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的訴求也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提出。儘管中間黨派對其之共同主張所作的努力所達到的成效有限，但其對於抗戰期間之中國政治的發展仍有其貢獻與正面意義，亦也具有正確性。而從中間黨派調解皖南事變（新四軍事件）的失敗與憲政運動的未盡全功，也顯示出中間黨派在國共兩黨間之困局的所在，即其見解與行動未獲國共兩黨認同時，中間黨派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即受到阻礙；而國民黨藉由國民參政會之參政員的分配等方式對憲政運動採取的抵制，也使中間黨派感受到自身在中國政局中發言權的有限與生存危機的加深，因而促成中間黨派聯合組建中國民主同盟。<sup>23</sup>姜平之《中國民主黨派史》；邱錢牧之《中國民主黨派史》；<sup>24</sup>陳志遠主編之《中國民主黨派史稿》；<sup>25</sup>戚如高、潘濤之《張瀾與中國民主同盟》<sup>26</sup>與周淑真之《中國青年黨在大陸與台灣》<sup>27</sup>等大陸學術著作皆對中間黨派在抗戰期間的政治活動有所論述，但其並非針對此一論述的專門著作，在內容篇幅上與所引用之文獻資料上皆未臻全面、完整，其大體侷限在中間黨派的抗日活動與政治主張、統一建國同志會與中國民主同盟的成立與發展、戰時民主憲政運動的推行、民主同盟與中共對成立聯合政府的推動等方面，基本上並

---

5 期（1994），頁 156-177；聞黎明，〈六參政員訪問延安再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 期（1999），頁 1-26。

<sup>23</sup> 張憲文著，《中華民國史》第 3 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286、287。

<sup>24</sup> 邱錢牧，《中國民主黨派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sup>25</sup> 陳志遠主編，《中國民主黨派史稿》（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3）。

<sup>26</sup> 戚如高、潘濤，《張瀾與中國民主同盟》（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sup>27</sup> 周淑真，《中國青年黨在大陸與台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無特別之創見，且受到過去中共意識形態影響而在論述上偏向中共並貶低國民黨及持右派政治立場的中間黨派。

和本書相比，後者在包含前者所論述之內容的同時，也敘及國防參議會的成立與發展、國民參政會的成立、中間黨派調解國共對立、中國社會各界在抗戰後期的整合等方面之情形，其篇幅與所徵引之文獻資料亦較前者廣泛、深入、完整，在論述上也並未刻意偏袒中共與刻意貶抑國民黨，此皆為本書具有之值得肯定之處。

## （二）本書所存在之可改進之處

除了大陸學者的相關著作外，張君勳著、中華民國張君勳學會編譯之《中國第三勢力》<sup>28</sup>與 Fung, Edmund S. K (馮兆基) 著之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9-1949* (尋求中國民主：國民黨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1929-1949)<sup>29</sup>皆對中間黨派在抗戰期間的政治活動有所論述。其中《中國第三勢力》的內容主要為作者個人之親身見聞，其將書中之歷史背景追溯至鴉片戰爭結束後，並一直延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與中共外交政策，且提及自身之如何應對中共政權的看法，和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西方民主價值觀念相結合之民主政府的期許。由於反共意識形態的影響，使其在書中不免表露出自身對中共的偏見，但其仍於書中生動而具體地敘述了抗戰期間中國的政治發展，與抗戰勝利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之中國政治的變化，並對蔣介石與中共的短缺加以批評，由於作者在書中所述多為本身之經歷，使其論述具有一定之可信度，說服力也比較強，而本書對中共的批評與其相比則顯得較為不足而需要改進。

另一方面，*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9-1949* 則從孫中山的政治思想由民主到集權的轉變、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之獨裁的類型為開端，敘述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中國從 1929 年至 1949 年間之民主發展的過程，其對於國民參政會

<sup>28</sup> 張君勳著、中華民國張君勳學會編譯，《中國第三勢力》（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

<sup>29</sup> Fung, Edmund S.K,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9-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在抗戰期間的發展與運作、戰時民主思潮及各種形式的民主政治制度構想、第三種力量之運動—中國民主同盟在抗戰期間於憲政運動，及其與國共兩黨的關係皆予以詳細而平實地敘述，在文獻資料的徵引上也算是運用得宜，同時對於中間黨派內部及其與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國共兩黨之明與暗的面向也有明確的論述，並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與當代之中國民主運動加以總結及抒發感想、期望，此較之本書則可謂其所超越之處，其中特別是在戰時之各種民主思潮的介紹與論述上，實為本書所不及之處，也是本書所須特別改進的地方。而另一方面，本書對中國之抗戰時期民主運動的發展之各種面向的敘述畢竟較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9-1949* 一書來得廣泛、全面，這也值得後者加以參考，以收相得益彰之效。

## 五、結語

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抗日戰爭可謂作為中國政治舞台之第三種力量的中間黨派相當活躍的時期，其發展勢頭並延續至抗戰勝利後的時局演變。整體而言，第三種力量不但對中國的政治發展顯示出其影響力，也對民主憲政運動的推進、國共對立的調解作出了貢獻，因此中間黨派在抗戰期間的發展對史學界而言也存在著重要意義。聞黎明所著之《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即為大陸史學界，乃至兩岸史學界最新之最完整的有關抗戰期間中間黨派之政治發展的學術著作；當然，任何一部學術論著都無可避免地存在著優點與缺點，本書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其既有許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也包含著一定之須加以改進之處，而此種情況從某種角度來看，也可算是反映出歷史的多重性與複雜性。就整個學術界的研究情形來看，中間黨派在抗戰期間的政治發展仍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間，亦值得有志於學術研究者加以探討。